



# 包身工的血泪仇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www.duxiu.com

# 包身工的血泪仇

.. \*

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、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4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01号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\*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2 1/2 字数 39,000

1965年10月第1版 196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—30,000

統一书号：11074·354 定价：(五) 0.19元

木刻插图·装帧：冒怀苏

## 目 录

包身工的血泪仇.....	錢小妹 (1)
回忆苦难的包身工生活.....	王桂英 (18)
苦海底层十五年.....	孟月珍 (37)

# 包身工的血泪仇

上海国棉六厂老工人 錢小妹

旧社会里人吃人，  
穷人血泪比海深；  
阶级压迫阶级苦，  
牢记深仇与旧恨。

在旧社会里，我当过包身工，同许多遭到同样命运的阶级姐妹一样，历尽了诉说不完的苦难。黑暗的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，但旧社会给我留下了沉痛的创伤。这个血海深仇，我永远也不会忘记。

每当我想起自己在旧社会当包身工的种种遭遇，阶级仇恨就像烈火似地在我心头燃烧起来。

## 离 家

我的家乡江苏泰县郁元村，解放前是个穷庄子，一片沙土薄田，长年干旱。仅有的一条“河”，是滴水全无的干沟，吃水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挑，还是又脏又臭的“死水”。村上的恶霸地主丁老虎，把这条干沟周围霸占了去，左近几百亩地都划

到他名下,由他再租給农民种。我家自己的地不够,也租种了他这样的九亩租地。虽說是九亩,实际上三亩也抵不上一亩用,好年景每亩也不过收上七、八十斤杂粮。打的粮食常不够繳租,不得不再向丁老虎借粮。可是借一斗要还一斗六,第二年还不起,利又轉变成了本。就这样,利上滾利,債上盘債,不几年工夫,連祖上传下的三亩半地,也都归了丁老虎,除此之外,还欠下他十石板的租子。有地的日子活不下去,丢了地的日子更难过了,一家人只好靠野菜、榆树叶、榆树皮养命。就連这样的苦日子,地主也不让太平过下去。

这一年,丁老虎的娘死了,他們拣中了我家那块租地做坟地。那时候,誰的租地被拣中了做坟地,那就算倒了楣:从挖坟、下葬,直到看管坟地,都要这家佃戶一手包。我們那儿地主家死了人,从挖坟的一天起,棺材一天不下葬,就得用活人代替躺在坑里,叫做“填坑”,下葬这一天,还要像孝子一样披麻戴孝。我爹白天給地主挖了一天坟,晚上为了搶着干点农活,只好叫我去填坑。这个地主婆是在二、三月里死的,小麦正抽芽,因为挖坟、下葬,人来车往,結果坟地旁边刚出头的小麦也被糟蹋得不成个样子。我家經歷这场大难,真象遭到水冲洗过一样的干干淨淨,每天連口湯都喝不上了。可是到了麦收时候,地主的租子还是一顆不許短少,狗腿子天天上门来討債逼命,全家人的心,都象掉在滾油鍋里。

就在这时候,同庄一个在上海当包身工老板的,到乡下来了。这人长得肥头大耳,还生滿一脸的紅疙瘩,象只癩蛤蟆,因为他姓周,人家叫他“周蛤蟆”。由于多少年生意經的鍛炼,

周蛤蟆已經背熟了一套騙人的鬼話。他的心像刀一樣厲害，但嘴比蜜糖還甜，能把一堆爛泥說成是黃金，把到上海紗廠做工，說得比登天堂還好。

周蛤蟆來到不久，就找上我家門來。他跟我爹媽說，曉得我家日子過不下去，看在鄉親面上，願意幫襯一把，把我帶到上海去進紗廠。他還說，到了上海一切都好，進了吳淞，花落天空。住的洋房、吃的大米、穿的花衣服，樣樣都有，做滿三年還可以拿到三石米。周蛤蟆見我爹媽猶豫不決，又緊盯着講了一句：

“我可是誠心拉扯你們一把，可不要錯過機會啊！”

這年我才十三歲，說真的，不要講大米飯沒有沾過嘴，就是吃糠咽菜也是有這頓沒那頓。當時，我別的不想，就想一件花衣服。記得三四歲時，娘用僅有的一條藍底白花頭巾，給我改做了一件花褂子，我一直穿到八、九歲，連肚子都遮不住了，還當寶貝似地舍不得丟。一天，給地主放牛，實在餓得支撐不住，一失足從一個高坡上滾下來，壓斷了丁老虎幾根麥苗，他給了我一頓毒打不算，還搶走了那件花褂子。我氣得哭了好幾天，以後再也沒有穿上花衣服。現在聽說到上海可以穿花衣服，做滿三年又能拿三石米，就信以為真，纏住爹媽要他們讓我去。當時一家窮得連菜湯都喝不上，做爹媽的也想給孩子找條活路，能混上一口飯吃，總比在家餓死好。結果，被包身工老板連騙帶逼，我爹就在包身契約上畫了押。

一九三九年端午節這天，我一生都忘不了的一天，周蛤蟆把我和同庄其他五個小姑娘帶走了。可憐我媽，還沒有把我

送到村口，就哭昏过去，我刚要哭叫着往回跑，还没有喊出声，凶狠的包身工老板就抓住我头发，把我拉上了船。

到了上海，在十六铺下的船。老板坐上黄包车，我们几个小姑娘跟在车子后面跑，一直跑到了曹家渡。当天，周蛤蟆给我拿来一件大红花衣服，一双垫得很高的特制的鞋。花衣服穿在身上虽然不大合身，两条小辫用红绳一扎，自己也觉得怪神气的，真恨不得马上能长出个翅膀，飞到妈身边给她看看。我真的穿上花衣服啦。这一天，我还真的吃上了大米饭，虽然因为包身工老板的限制，还没有吃饱。可是这一夜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老是想在花衣服、大米饭……。等到我刚迷迷糊糊睡去，却被一阵疼痛惊醒。一看，原来周蛤蟆拎着我的耳朵，叫我赶快起来穿上花衣服，去排队等候考厂。

我考进了日本人开的“喜和纱厂”（就是现在的国棉七厂）。这一天考厂回来，我的辫子被剪掉了，花衣服也被剥下，仍旧穿上乡下穿来的那件破衣裤。后来才知道，那件花衣服是专给包身工考厂用的。当时，我还天真地去问周蛤蟆：“你不是讲，到了上海给我们做花衣服穿？给我们……”还没有等我把话讲完，周蛤蟆就给我几巴掌，打得我天旋地转，他的脸完全变了。从此以后，我和其他三十几个被称作“包饭小姑娘”的一样，落进了这个万恶的包身工老板的魔掌。

## 苦 海

进了喜和纱厂，我在细纱车间学做挡车“接头”。那时候，站起来没有车子高，接头时要踮起脚才能够到。人小手生，干

起活来笨手笨脚，一看见紗头断得多了心就更慌。第一次，我拔筒管不得法，撕掉了手上一大块皮，痛得直哭。拿摩温看见了，一句话不讲，上来抓住我的头发就往墙上撞。从此，拿摩温只要在旁边一站，我的手脚就会发抖。越是抖，越接不好头，也就越要倒楣。拿摩温看见誰断头一多，接不好头，抓起一把筒管就往头上擲过来。有一次，拿摩温向我擲筒管，可是沒有擲准，竟恼羞成怒，拿起一根絞花衣的竹針走来，往我手上速刺了好几下，血順着我的手背流到了地板上。她还不罢休，又拿紗綫把我十个手指头統統繞起来，用一尺多长的戒尺专打手心和手指骨，打了再罰我跪筒管。

日本紗厂的车间里，除了压迫工人的拿摩温、狗腿子以外，还有日本領班和东洋婆子在监视工人。他們只要看到誰不順眼，动手就打，抬腿就踢。管我們车间那个滿臉横肉的本領班，待我們更是狠毒得要命，整天棍子不离手，来到车间，稍不称心，抡起棍子就打，真是個活閻王，人們背后都叫他“矮閻王”。矮閻王一进车间，拿摩温打罵工人也格外卖力，把我們这些包身工就更不当人看待。

那时候，车间里到处是飞花乱窜，整天象下雪似的，我們嘴里、鼻子里都是花衣，臉上被花衣粘得象蛆爬一样地难受，一天十四、五个小时的工做下来，被汗水粘在身上的花衣，可以一片片往下揭。车间里的悶热更是难当，走进车间就悶得喘不过气来，溫度經常在华氏一百多度，就象一只大蒸籠。可是就是热死人，也不准出去透口气。有一天，我在车间里实在支撑不住了，昏倒在地上。几个工人赶紧把我抬到通风的地方，

一口气还没有缓过来，拿摩温跟在矮閻王后面赶来了。他们一面轰赶抢救我的工人，一面骂我装死，上来就是几脚，踢得我血流了一地，直到现在腿上还留下两块大伤疤。

资本家只顾榨取工人的血汗，哪管工人死活。工人进了车间，就象进了老虎口，做生活得把性命拎在手里，经常有工人因为出了事，被抬出车间去。我进厂没有多少日子，就亲眼看见一个加油工被卷上了皮带盘，另一个工人发现后立即跑去，打算关上马达，可是日本领班矮閻王正好在旁边，使劲地把他一推，还说：“死掉个把人算什么，关车造成损失，谁赔得起？”这个加油工从皮带上摔下来时，已经血肉模糊，惨不忍睹。那时候，死掉几个工人，根本没啥稀奇。

我们这样拼死拼活地在厂里干上十几个小时，可是连吃饭、上厕所都不许可。那时，工人们吃饭只能用冷水泡一泡，偷着吃下肚子。而我们包身工，吃起来连泡也不用泡了，因为带的都是一点苞米菜粥，只要能抢到嘴里就行。每天吃这些东西，还要象偷来吃似的，抢着吃几口，赶快跑到大弄堂看看，没有人来，赶紧回来再抢几口。日本领班和拿摩温一来，就得赶紧把饭盒子藏好，手脚慢一点，他们过来一脚踢光，这样，挨饿不算，还要挨一顿打。

那时候，有些厂是规定凭牌子上马桶，而我们厂连牌子也没有，干脆不让去。有时日本领班和拿摩温明明知道你要上马桶了，有心在你身边一站，让你裤子尿潮了都不能动。有一次，日本领班矮閻王看见我到马桶间去了，就拎着棍子跟来，在马桶间门口一站。我发现后，吓得马桶还没有上就往回跑。

已經来不及了，他上来一把抓住我的头发，象老鹰抓小鸡一样把我抓起，又按倒在地上，拿起棍子劈头劈脸地乱打。棍子打断了，就用皮鞋踢，头发也被一把一把地扯下来。他一边打还一边骂：“好啊！臭东西，刚来就学会偷懒，跑到厕所来揩油！”最后，他硬叫我連續做了三十几个小时，才放我回去。回到“家”，又遭到老板一顿毒打。我躺了两天两夜动弹不得，連一滴水都沒有喝。

每天十四、五个小时做下来，罪并没有受完，还要在几尺长、只能容一个人通过的木栅栏里，挤上一、两个小时，好久向前挪一步，等着由几个抄身婆从头到脚、渾身上下摸个够。有时，甚至連衣服、鞋子、袜子都得脫光給她們看；还要张开嘴巴、翘起舌头，让她們检查。旧社会里这种罪恶的抄身制度，是对工人的人身侮辱。

抄身婆最恨我們包身工了，因为包身工差不多都生疮、烂脚，脓血把衣服都粘在身上，再加上沒有澡洗，沒有衣服換，个个身上都有一股难聞的腥臭味。我們还没有走到抄身婆身边，她們已經捂紧了鼻子。有时她們嫌我們身上脏，不肯用手来抄，叫我們自己把衣服解开来給她看，这等于揭我們一层皮。有时衣服还没有完全解开，血已經把衣服染得星星点点。有一次，我的脚烂得不能走，在车间里撿了团油花衣包了一下，那知道在厂门口被抄身婆看见了，她瞪着两眼硬說我偷了花衣，上来一撕，我烂脚上的血淌了一地，还被日本大班叫人拉在一边，打得鼻青眼肿。幸好这是放工时刻，激起了一些老工人的气忿。工人們一齐涌上来評理，吓得日本大班赶快把

我放了，但还是罰了我一星期的工錢。

罰我的工錢，等于挖包身工老板的肉。老板情愿厂里把我們打个半死，或是罰我們連續做上几天几夜，也不愿意罰一分錢工錢。这一天，当然又是我大祸临头。回到“家”里，只见周蛤蟆冷冷地对我讲：“你不是烂脚嗎？来，我就来給你治！”說完，他拿起一根烧得通紅的火筷子，咬牙切齿地往我脚上燙。嘶的一声，青烟直冒，我还没有喊出声来，就昏过去了。

## 折 磨

厂里的資本家也好，包身工老板也好，他們这样穷凶极恶地压榨我們包身工，都是为了要喝我們的血。

我們包身工人小，在厂里干着跟成年工人一样的活，还可以无限制地延长工作時間，可以任性地打罵、欺侮，不愁我們反抗。成年工人的工錢少得可怜，不够养家活口，而我們包身工的工錢还可以压得更低更低。正因为这样，資本家才串通包身工老板，到乡下去千方百计拐騙沒有活路的小姑娘，来替他們做牛做马。而包身工老板呢，他們一面用鞭子赶打我們去替他卖命，一面尽量降低我們的生活条件，逼我們吃得、住得比牛马还不如，从这当中榨取血汗，因此，我們工錢再低，他們照样能从我們身上賺錢。而且蓄养的包身工愈多，老板的身价、地位也愈高。

几年来，我們眼看着包身工老板一个个发起来。周蛤蟆一年四季的衣服有几箱子，进出都乘包车，在我被騙来上海做包身工的第二年，他回乡一次买了四十亩田。包身工老板如

此，資本家在包身工身上敲骨吸髓所榨取的利潤，更可想而知了。

說起包身工的生活，真是比牛馬還不如啊！

我們住在包身工老板家里，洗臉連破布頭都沒有，洗臉時冷水一沖，用衣服一抹就行了；在垃圾桶里拾來的破木梳，三十幾個人輪流用，上工來不及，用手指頭在頭上抓抓就進廠了。一間十多個平方米的房間里，裝進三十幾個包身工，睡覺不是躺下去，而是塞進去的。冬天沒有被子，大家擠着取暖，還容易熬過去；天氣一熱那就苦啦！跳蚤、蚊子、臭蟲能把人吃掉，從五、六月開始就不要想睡好覺。到了大熱天，幾十個人擠在一間小房間里，熱氣加汗氣，就象進了蒸籠，但是天氣再熱，老板也不讓我們到弄堂里去透口氣，熱死也要待在這個蒸籠里。

在包身工老板家里吃飯比睡覺更難。我們每天吃的苞米菜粥、臭咸菜，菜皮常是從小菜場、垃圾桶拾來的，燒出來的稀粥照得見影子，如果不當心把飯碗掉進粥桶，粥湯能濺上天花板。就是這樣稀的粥，擠在後頭的人，還不一定能輪到一碗。逢到做夜班和廠休日，只吃早晚兩頓。因為據老板講，做夜班的日子，白天睡覺，多吃了是糟蹋糧食；廠休日不用出力，當然也不用多吃了。其實，到了廠休日，老板給安排的生活更多更重。

稍有點空閑，周蛤蟆就分派我們去拾菜皮。我們都把这當作“好差使”，爭着要去，因為拾菜皮時常能拾到一點蘿蔔之類的東西充充飢。有一次，我們幾個包身工實在餓得難受，在垃圾桶邊和狗爭奪起來。結果，我的腿被狗咬了一口，爛了幾

个月沒有收口。我們隔壁一个包身工老板更加心黑，給包身工烧飯的事都由老板娘亲自动手，天不亮老板就把包身工一个个赶打起来，可是老板娘却不起来烧飯，等她起来，粥还没有烧好，上工時間已到，包身工常常只好餓着肚子进厂。

我們穿的衣服，都是从旧貨攤上买来的，沒有上身就先要补。一件衣服穿上身，就不知那天才能脫下来換洗，因此每个包身工头上、身上，都是虱子成堆，伸手就能撈到一把。我們从沒有穿过象样的鞋，从垃圾桶里拾来一双破鞋，要用绳子扎在脚上才能走路，还要由日夜班小姐妹調着穿。拾不到破鞋，就是天寒地冻，寒风刺骨，也都是赤着脚进厂。有一次天下雨，虱子咬得我实在吃不消了，身上抓的沒有一处好皮，到处是疮，衣服破得都补不在一起了，我就向周蛤蟆提出，給我一件衣服，只要能补着穿就行。誰知，这一下子把他惹火了，认为是触犯了他的家规，马上喊了两个人把我捆起来就打，周蛤蟆一面打，一面对其他几个包身工吼叫：“今后誰敢要这討那，就跟她一样！”

我們在工厂里干了十几个小时下来，已經筋疲力尽了，但是不管白天、黑夜，只要回到“家”，就有做不完的“家务事”：拾菜皮、倒马桶、洗衣服、抱孩子……甚至連老板一家人的脚，都要我們洗。周蛤蟆有脚癬，每天都要我們給他搥脚。他的脚什么时候痒了，什么时候就把我們打起来給他搥脚抓痒。搥輕了要打，搥重了他上来就一脚，常把我們踢得鼻血直流。搥过脚，还得給他洗。給老板洗脚，比搥脚更难，水冷一点不行，燙一点也不行。有一次我給周蛤蟆洗脚，也不知是不是水燙

了一点，他拿起一盆洗脚水就往我头上浇来，我全身被浇得透湿。到了热天就更苦了，十几个小时劳动下来已经头昏脑胀，回来还要忍着蚊子叮咬，给老板捶背、打扇、赶蚊子。有次，我给周蛤蟆打扇，因为实在太疲劳，煽着煽着打起盹来。老板看见了，一把抓起我的头发，狠命地往墙上撞，撞得我的血流得满脸都是，老板还说：“看着！我就会治你这个瞌睡病。”他恶毒地找来几只破碗，叫我跪在碗上，头上再顶一只脚盆，手还要不停地给他煽。周蛤蟆这才重新躺下，眯着眼狞笑着说：“你就跪在这里睡吧！”更加残暴的是，老板不管把我们折磨成什么样子，都不准叫，不准哭，逼着我们默默地忍受种种苦刑。

## 血 泪

包身工是不能生病的，生了病也不准休息，照旧被老板用棍棒赶打着去上工，如果病得实在厉害，躺下来了，那么躺一天，将来包工期满，要罚做三天补偿。有个比我早来的小姑娘，已经苦做了四年多，就因为生过病，老板说她还没有做满三年。实际上生病躺下来，又要挨打，又要挨饿，罪更难受，所以我们生了病，都不敢吱声，硬挺着照样干活，不知多少小姑娘就这样活活地拖死了。

这样的事情，很多很多。和我同来上海的一个“堂姑娘”，是我们东庄上的。她是爹妈从育婴堂抱来的，从小没有吃过奶，身体本来虚弱，做包身工后，经不起折磨，老在生病。她每天带着病去上工，常晕倒了爬起来，强喘着气再干。因为干不动，遭到的毒打也最多，后来被折磨得象根枯草，已经完全被

榨干了。最后，日本領班不許她进厂，包身工老板看她已没有什么油水，也把她一脚踢出门去。后来听说她是倒在阴沟里死去的。

和我同来的另一个小姑娘，叫丁紅英，一連发了好多天高热，烧得嘴上沒有一处好皮，还一直不敢吱声，照旧掙扎着去上工。等实在支撑不住停下来，老板还硬逼她去拾菜皮。晚上，紅英烧得不时昏迷过去，老板連杯水都不給她喝，还說“生活做不动，就吃不动”。我放工回来，紅英一把拉住我的手，有气无力地哭着說：“小妹，快想法弄碗水給我喝吧！我渴得难过……。”好不容易等到老板睡觉，我用飯盒盛了些冷水递給她。她咕嚕咕嚕几口就喝光了，再也沒有讲话。第二天，天还没有亮，老板又来踢她，赶她起来和我們一齐去上工。她一动也不动，原来她早就死啦！这个受尽了苦难的姐妹，还是我們用自己睡觉的席子把她輕輕地卷起来，埋到浜北（苏州河北岸）荒地地里的。

正好这时紅英的媽赶来上海，想看看她的女儿。起先，周蛤蟆想瞞住，撒謊說：“紅英过得很好，你不必看她了，放心回去吧，再过两年就可以拿三石米回家給你养老了！”紅英的媽再三要求见见紅英，总是不得許可，才感到事情不对，坚决提出：“不管是死是活，我也要看她一眼！”这时，这个残忍成性的吸血鬼，见抵賴不过了，忽然放下脸来，厉声說道：“好吧！你来得正好，你大概是打算来还債的，我正要找你呢！你家紅英刚来沒有几天就病倒，看病吃药花掉我一两百块钱；一年要吃我三石六斗米，共吃了我十八个月……。”紅英的媽这才知道

真相，又气又急，嚎啕大哭起来。周蛤蟆猙獰地瞪着一双布满血絲的眼睛，高声大叫：“不准哭！如果你再在我这里哭一声，就打断你的狗腿！”紅英的媽身边带着的几个盘缠錢，也被周蛤蟆夺去，然后被赶出大门。她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被逼得跳了苏州河。

和我同来上海做包身工的五个小姑娘，不到两年时间就死去了三个；和我同房間的三十二个小姑娘，在一年里也死掉十一个。我們有多少个階級姐妹啊，在这里很快被榨尽了血汗，又象甘蔗渣一样被抛出去。这里死得快，那里一批又一批接替的人来得还要快。那时候，在地主階級的压迫和剝削下，乡下吃不上飯的人家多，这里是火坑，就有那么多小姑娘被騙着不断地来跳火坑。

也有的包身工受不了折磨而逃跑的，但多数仍旧被抓回来。我們隔壁一个紹兴小姑娘，好容易逃离了包身工老板的家门，結果又在輪船碼頭上被抓回来，吊着打得死去活来。老板經常这样讲：“你們只要到了上海，十八个筋斗也翻不出我的手掌心！”

老板为了提防包身工逃跑，进厂、放工都亲自押解着。包身工从工房到車間，从車間到工房天天两头不见太阳，不准和外面人接触。即使亲人来了都见不到，见到了也不敢讲话。

包身工里年岁稍大一些的，往往被禽兽般的老板所糟蹋。包身工老板强奸几个包身的小姑娘，是不当一回事的。前面讲的那个紹兴小姑娘，逃跑被抓回来不久，老板就奸污了她，然后把她卖出去当妓女。我們小姐妹里，有个叫周桂英的，

“滿師”時已經十七歲了，周蛤蟆總是不放她走。誰知，這個人面獸心的畜生已經看上她了。周桂英遭奸污後，被逼得發了瘋，後來弄得下落不明。

做滿三年，僥幸沒有死的包身工，仍然擺脫不了老板的魔掌。老板往往逼着繼續在他家裏做“帶飯小姑娘”。不在他家“帶飯”，就要“停生意”，不能在工廠做工，弄不好還會把性命送掉。從“包飯”到“帶飯”，似乎要好一點了吧，其實不然，還是做老板的奴隸，繼續為他賣命。每月工錢幾乎全部要作為“飯錢”交給老板，自己還要應付滿天飛的打秋風帖子。周桂英做了近兩年“帶飯小姑娘”，不但連件褂子都沒有，還欠下老板一大筆債，最後遭到老板的毒手。我們國棉六廠有個老年工人蕭珠子，在舊社會從十三歲起做包身工，一直做到二十一歲，“帶飯”時的工錢全部被老板拿去，結果回家時連路費都沒有。這是一筆什麼樣的血泪賬啊！

## 余 生

我象牛馬一樣，挨打挨罵，受凍受餓，熬過了四個年頭。四年裏，我蓬頭垢面，滿身脓瘡，不但沒有長高，反而更加枯瘦焦黃，老板的大腿伸出來，比我腰杆還粗得多。

就在這時候，我媽把鄉下能變賣的東西全都賣了，湊錢來到了上海。一連五天，我們母女都沒有見着面。但我終於得到了這個消息。我想，這些年裏，有幾個包身工是活着出去的？在這裡早晚總是死，我一定要趁此機會逃出虎口，情願回鄉餓死也不在這裡活受罪。想到這些，我決心下定了，胆子壯

起来，讲话的声音也大啦。反正豁出命去，准备和老板拚了！我工不上，饭也不吃，整天大吵大闹。周蛤蟆看到我那股劲，知道打、骂、威胁，已经不管用了。我给他做牛做马卖了四年命，早已“满师”，他怕这样吵吵闹闹张扬出去，将来断了他回乡继续诈骗的后路，才不得不同意让妈把我带回去。

老板是不会轻易放过一个包身工的。周蛤蟆对我妈说：“本来还要做半年才能满期，现在看在乡亲面上，可以让小妹先回去，但是有两个条件：第一，欠下的半年工，折粮食一石八斗；第二，不许回去胡说我这里的坏话，要是断了我的后路，可别怪我不讲情面！”

就这样，我替他做了四年牛马，没有拿到过一分工钱，临了还倒欠他一笔债。在那吃人的世界里，有什么理可讲！我们娘俩走出周家，在上海讨了一两个月饭，才买上船票回家。下了船，还有八十多里路，我们娘俩又走了七八天才到家。到家时，我只剩下一口气了。

回到家乡，日子仍旧过不下去。抗战胜利后，我又重来上海，辗转托人情，花了六石米钱，才添进了当时的“中纺六厂”（就是现在的国棉六厂）。厂里，领班、工头仗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势力，欺压、剥削我们工人，跟日本鬼子的时候没有两样。而我进厂花的六石米钱，是借阎王债得来的，进厂以后连本带利滚了三四年，直到解放还没有还清。

## 见 天

一声炮响，迎来了解放。

是共产党、毛主席給我拨开乌云重现了天日，暗无天日的牛马生活这才一去不复返。原来騎在我們工人头上为非作歹的包身工老板，罪行得到了清算，罪大恶极的周蛤蟆，被鎮压了。拿摩温制度也废除了。

我們工人同全国劳动人民一样，不仅在政治上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，真正扬眉吐气，挺直了腰杆子做人。而且在經濟上、文化上也翻了身。我的丈夫解放后才算有了正式工作，现在是鉄路工人；我祖上几輩子都是一字不識的睁眼瞎子，现在我也讀書識字了；解放前我四个孩子死了三个，现在我的三个孩子都已长大，讀了书，大的已經讀到专科。

尤其使我終身难忘的是，象我这样一个在旧社会受尽凌辱、受尽压迫、受尽歧視，被地主、资本家踩在脚下、視如牛马的包身工，今天在党的培养教育下，已經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我虽然只是做了一些我們工人應該做的事情，但是党却給了我莫大的荣誉。一九五九年以来，我連續被評为市的先进生产者、五好工人和三八紅旗手。

記得一九五九年的一天，我們厂的党支部书记对我讲：“小妹啊，組織上考虑让你出国参观訪問，你有什么困难沒有？”他见我一下子惊得呆了，又笑着重复了一遍：“組織上决定让你出国去見識見識，现在就可以作准备啦！”当时，我激动得半晌也說不出話来，只是眼泪象断了綫的珠子，滾滾地流出来。我想起了自己沒吃少穿的童年，想起了領班、拿摩温的棍棒，想起了当包身工被折磨得只剩下了一口气，还有許多已經死去的階級姐妹。

这次我們出国，是代表中国工人阶级，旅行訪問了四个国家。在各地，我們都受到当地人民尊敬、热情的接待，这体现了我們国家越来越高的国际威望。我作为一个中国人，特别是作为中国工人阶级一分子，而感到自豪。回国以后，組織上又用了近一个月时间，讓我們到全国十几个城市参观訪問。我亲眼看到了各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設，和祖国光輝灿烂的前景。

解放以来，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，我們全国人民已經走上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光明大道。可是，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，还过着我們在旧社会那样的痛苦生活，而那些不甘心放弃騎在人民头上为非作歹的特权的阶级敌人，还在千方百计地企图把我們拖回到資本主义的老路上去。不！我們不能答应，一定要跟他們坚决斗争到底。我們一定要牢記过去所受的阶级苦和民族苦，提高革命警惕性，以阶级斗争为綱搞好生产，用实际行动来支援世界上一切被压迫的人民，永远沿着党和毛主席所指引的革命道路奋勇前进！

(刘吕荣整理)

# 回忆苦难的包身工生活

上海国棉十二厂老工人 王桂英

我们从旧社会活过来的老工人，谁身上没有伤疤？谁肚里没有苦水？我手抚伤疤，口吐苦水，心里就象烧起了一把火。你要知道旧社会是啥样子，我就给你说说我苦难的包身工生活。

## 从一顿稀粥讲起

我是十三岁那年跟着包身工老板到上海来当包身工的。

我老家在苏北泰州。父亲是泥水匠。靠他一点手艺，养不活一家七口人。我们姊妹们七、八岁就下地给地主干活了。每天鸡叫出门，打草呀，看牛呀，种田呀，拚死拚活，换地主家里顿把稀的吃。后来，我家里又向地主佃了五亩地，妈妈带着我们姊妹白天给地主出工，晚上披星星、戴月亮地在租地上耕种。每一亩地的租子要交一石二斗。

每年庄稼收割下来，大箩小筐地抬送到地主家去，我家一年辛苦，到头来只给自家留下一堆麦秸豆柴，终年吃不到米粮，靠喝点杂粮稀糊过日子。记得我还是孩子的那时候，是多么想吃一顿白米饭呀，可是，在那个年月，穷人家想吃一顿大

米飯可真是比登天還難。黑心的地主，為了要佃戶盡快繳租，想出了一樁花樣：在收租的時候，佃戶送租谷到他家去，可以吃一頓秬米稀粥。這對我們這些不懂事的小孩子，是一宗了不起的誘惑，所以我便爭着要跟媽媽去送租谷了。有一回，我跟媽媽抬着一筐黃豆，走了七、八里路，進了地主的院子。地主拄着拐杖走出來了，他手上戴着玉鐲，肥頭胖腦的真象一口老母豬。他先把我們的豆子挑剔了一番，又叫人用斗來量。他家的斗特別大，倒進去，顯得淺了一些，地主馬上把臉一板說了：“你們這些窮鬼，總是不肯繳足租子，快回去補來，粥也不用吃啦！”我聽說沒有粥吃，急得差點哭出來。媽媽氣得不得了，可是她知道這是地主在強索，不給他送來是不行的，只好忍氣吞聲。於是她又來回奔了十多里路，在懷里揣了幾斤黃豆送來了。本來，那斗里的黃豆只是稍為淺了一點，再添一小把便滿了。媽媽想把多餘的豆子留下來，地主却一定要她全部倒進去。媽媽回答說：“斗里不是滿了嗎？”地主火了，腮幫子上兩塊肥肉一抖說：“你明年還想不想種我家的地？”媽媽又有啥辦法呢？只好把豆全部倒進了大斗。這樣，地主才叫人把我們帶到灶間里，給了我們兩碗冷粥。我竟一口氣把它喝完了。總共只有兩碗粥，我吃了媽媽就沒得吃，只好餓着肚皮回家。這段路不近，從大清早起她來回跑了兩趟，這時已經餓極了，一路上兩腿發軟，口里直泛清水，走過河邊，她彎下腰來，捧了兩口河水填填肚子，才支撐到家。一進家門，她就跌倒在地上。

爸爸看着我們心里發酸，過了一會就和媽媽商量，決定讓

我們吃一頓干飯。家里哪有許多大米煮飯呢，我們是煮了一頓高粱飯吃，這是難得的一頓干飯，一家人高興地吃了。沒有想到，吃了這頓飯，卻惹出了一場意外的大禍。我媽平時一直只喝點湯湯水水過日子，這次偶然吃了頓高粱干飯，胃里受不了，又由於她長期勞累過度，身體衰弱，結果便爆發了一場大病，病得連頭髮都脫光了。地主的殘酷剝削，連年的自然災害，本來已經鬧得我家里過着不是人過的日子，現在媽媽病倒了，干活的人又少了一個，一家人更是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最後，我便被迫跳進了包身工的火坑。

這年夏天，上海一個姓劉的包身工老板來到了我們庄上。他頭戴金絲草帽，身穿香雲紗短衫褲，腳蹬黃皮鞋，滿手金戒指，到處串門子，炫耀他的闊氣，把上海這個地方說得象天堂一樣。他走到我家，對我爹說：“你們把孩子留在家里，吃苦受累，這是害了她們呀，還是讓她們跟我到上海去做工，上海的大米賤得象蛆一樣！”我爹說：“孩子還小，離不得爹娘呀！”他說：“你還不相信我呀！孩子到我家里，我還不是當自己的孩子一樣看待？孩子包給我，你們不但可以賺進一筆包身銀子，三年之內，吃穿用全部歸我，你們做現成的父母還不樂意？再說，三年之後，孩子學會了本領，賺了錢又往家里寄了。這麼好的機會，錯過了可再也碰不上啦！”他花言巧語，說得唾沫四濺。我爹還是下不了決心，娘在一旁哭不住聲。我心里想，老板的話，雖然不會句句是真，也不會都是假的，進廠做工，即使再苦，總比在家里挨餓受凍強些。主意打定，我自己鑽出去跟老板說道：“你帶我去吧，給多少包銀？”老板朝我上上下下打

量着問：“你十三岁了？”我說：“別看我个子矮小，做生活不比別人差。”老板阴阳怪气地摇摇头：“怕不够高，工厂里不要你。”我以为他真的不肯要我，急得哭了。老板站起来說：“不要急呀，来，来，我給你量一量看。”量完了，他又皺着眉头說：“实在太矮了，太矮了！”我便对他說：“只要你肯帶我去，我宁愿少几个包銀。”其实，老板装腔作势的目的，就是在等我自己說这句话，他接下去便說：“那么，就給五十块吧，……写不上号头，我还得白白养你一年半載哩。”从此，我就以五十元的代价，包給了老板，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小奴隶，至于那五十块包身銀，后来我家里一个子儿也不曾到手，根据老板的計算，反而是我倒“欠”了他的債，由我額外給他多做了一年的工，才算还清。

那次，和我一同从乡下出来的一共有五十多个年龄相仿的小姑娘，我的一个堂妹妹也在一起。我們啃着老板发的麸皮餅子，走了一百多里路，到新港上的船。我們都是第一次离开爹娘出门，一路上少不了哭哭啼啼，等到上船，便哭得更凶了。老板哄我們：“你們哭得好沒来由！应该高高兴兴地笑呀！到了上海，吃的是大米，住的是楼房，慢慢我給你們做一套花衣裳，嘿，那日子，不知比你們在家里强多少倍哩！”到了上海，日子到底是什么样子呢？我們很快就尝到滋味了！

### 写不上“号头”

从輪船上下來，老板直接把我們領到了杨树浦齐齐哈尔路的工房。这是日本資本家开的协隆紗厂（就是现在国棉十

五厂的一部分)的工房。这一大片工房被一百多个包身工老板分占着,我們老板占着47号、48号两幢房子。当时正是大伏天,我們在路上走了两天,身上都发臭了,所以到上海后的头一件事,便是要洗澡换衣服。洗澡倒可以用冷水擦一擦,要换衣服便成问题了。我們身上的单衣,在家里时还要跟姊妹們合穿的,誰能带得出另外一套替换的衣服来呢?我們要求老板給买,老板的面孔,就和在路上时不一样了。他眉毛一竖,罵开了:“生活还不会做,倒先要衣服穿了!一件衣服多穿几天会死人?……快給我去睡觉,明天跟我去写号头!”于是大家只好穿着給汗水浸出了盐花的衣服上楼去。

我們睡的倒的确是楼房。我上楼一看,只见滿地都是草席,看不见一张床鋪。老板家里,原来就有百把人吃包飯,我們一去,一共有百五、六十人,全都挤在那两間客堂楼上,房間里有股刺鼻的臭味,一躺下去,身体贴着身体,連翻个身的余地也沒有。可是这点空档,每天还睡两批人哩,上日班的走了,做夜班的睡,上夜班的走了,又給做日班的睡。我躺下不久,就觉得渾身发痒,坐起来一摸,尽是臭虫,每只都吃得象老板一样胖,……这一夜,我們很多人都沒有睡着。这就算是我們“好日子”的开始。

第二天,老板带着我們去“写号头”。我个子长得太矮小,第一次果然沒有写上。回到工房里,老板把我埋怨了一頓:“看,在你家里,一定要我多少多少包銀,现在,連号头也写不进,只好給你吃干飯。”

但是,天下哪有让你白吃飯的老板呀!不进厂做工,他家

里也有干不完的活：拖地板、洗衣服、倒马桶、做針綫、給老板娘抱孩子……还要烧一百几十个人的飯。所有这些工作，当然都落在我們十几个沒写上号头的小姑娘头上。我和堂妹妹（她长得比我更矮）管烧飯。干这项差使，每天半夜就得起来，淘米、生火、拉风箱……一直忙到晚上靠十点钟才能睡觉，一昼夜只能捞到两个多小时的休息。这还不算什么，最叫人发愁的事情是：烧这一百多人的飯，柴禾要我們自己去拾，老板是出錢买的。上海沒有柴山，也不长芦葦，每天到哪里去拾这許多柴禾呢？拾不到，老板就不准吃飯，老板娘的棍子就劈头劈脑落到头上来。記得有一次，我和堂妹妹一道出去拾柴禾，两个人不知跑了多少路，也沒有找到一点，只好两手空空地回来。老板娘见我們拾不到柴禾，不准我們吃飯，还罰我們在泥菩薩面前跪了一炷香。

### 一連串的灾难

我在老板家里烧了五个月的飯，也不知吃了多少苦头，心里急死了。那时候，在我看来，进了厂的姊妹命运总要比我好。不必象我一样天天去拾柴禾，不必半夜三更起来拉风箱。所以，一心一意想要写上个号头。我陆續試了好几个厂，都沒有成功。有一回，我向一个吃带飯的女工借了件旧旗袍，跑到离工房比較远的裕丰紗厂（现在的国棉十七厂）去碰运气。在招工給我量身材的时候，我稍稍踮起了脚跟，靠着旗袍的遮掩，招工不曾看出来，便把我录取了。五个月来，我日思夜想的心事实现了，高兴得不得了。从此，我口袋里也算有了一张

“小照牌子”(出入証)。我以为,有了这张牌子,往后的日子或许会过得好些。

哪里知道,这张小照牌子,不但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好处,相反,却给我带来了一连串的灾难。自从我写上号头那一天起,便失去了进出工房的自由。原来,我住的工房是协隆纱厂的,这个厂和上海纱厂都属于一个系统。所以协隆、上海等纱厂的工人住在这幢工房。我因为在这几个厂写不上号头,才进了裕丰,照当时的说法,这叫做“外号头”,而“外号头”是不准入内的(上下班时,工房门口有日本人检查小照牌子)。从此,我每天上班下班,只好比人家起得早,回来得晚,趁管门的日本人还在睡觉或者离开岗位,偷偷地溜进溜出。那时候,工厂里实行的是两班制,日班夜班都是“六进六出”,人家四、五点钟起来,我比人家还要提早两小时,喝几口冷粥,赶快往外溜。晚上要等到八九点钟才敢回来,好象做贼一样。

有了这张小照牌子,我可以进厂做工了。进了厂,我才知道,工厂原来是一座活地狱。一走进车间,就好像走进了蒸笼,空气中浑沌沌的都是花衣、灰尘。一到夏天,温度高到华氏一百多度,又潮湿又闷热,飞花粘在脸上、手臂上,可以一层层地剥下来,浑身汗毛孔都给封住了。一张嘴,花衣、灰尘都往肺里灌,那个难熬呀,也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所以,我们这些当包身工的,害的不是干血癆、月經病,便是烂手烂足,百孔千疮。走在路上,一瘸一拐,活象一群小囚犯。车间里,常常有人晕倒,晕倒了,也没有人管,几个小姊妹七手八脚往旁边一抬,让她听天由命去了。有一回,我在车间里走,脚踏在筒管上,

滑了一跤，跌伤了腿，我也不敢停工，继续咬咬牙，硬撑着做生活，因为停了一工，是要补三工的。日子一久，伤口越烂越大，一条腿痛得象芦柴一样，上班下班，都得靠小姊妹背，有时，我看小姊妹也筋疲力尽，放了工就干脆慢慢地爬回去。回去晚了，老板娘还要叫骂：“小婊子，到哪里玩去了，到这时才回来！”

我进厂后被分配在细纱间。在车间里，日本领班、东洋婆、拿摩温，是可以随便打我们、骂我们的。一开头，东洋婆在我们手里塞了一只纱，叫我们靠墙站着，学习“扑头”。谁要是站得腿酸了，想蹲一会，东洋婆就要抓住头发往墙头上狠命地撞。一星期以后，我开始上车学接头，东洋婆先教一次，也只教一次，接着就叫我们自己做，她在一旁看着，要是接不上，就撕眼皮、揪耳朵、用木棍打手……车间里每天都有十个八个人被打得眼青鼻肿。

有一回，东洋婆在车弄堂里枕着粗纱睡觉，睡到三点钟光景醒过来，看见我在旁边，用手指指手腕，意思是问我几点钟了。我那时连数字还看不懂，不识得钟，又不敢不回答，只好根据自己的估计，伸出两个指头，意思是说：“两点钟光景。”东洋婆觉得时间还早，便又睡下了。凑巧，她刚睡下，日本领班来巡视车间了，看见东洋婆还睡着，走上去一脚，把她当枕头的粗纱踢了丈把远。东洋婆一骨碌爬起来，羞得满面通红，等领班一走，便找我来出气了。她嘴里噙着咕噜骂着日本话，象一头雌老虎似地扑上来，揪着我的头发，狠命往墙上一推，接着又把我往地上连掼了几掼，直掼得我两眼发黑，浑身骨头都象抖散了似的。她发泄够了，又逼着我马上站起来到车上做

生活。我头上、身上的紫血块，过了几个星期都没有褪。

还有一回(我已经进协隆纱厂了)，离下班还有十来分钟，我从口袋里摸出一块木梳站在车旁边梳头，一个绰号叫“四只眼”的日本领班，象鬼魂一样悄悄地从我背后走上來，突然用手紧紧地蒙住我的眼睛。我以为是那个小姊妹跟我开玩笑，正要叫喚，腿肚上猛地挨了几皮靴。他放开手，叫来了摇车头(相当于现在的落纱组长)，命令她找油线绳把我吊起来。那摇车头小名叫小四子，平时待我比较好，她故意在车间里东跑西跑，装作找不到油线绳的样子。日本领班更火了，又伸手打了我几巴掌。回头也给了摇车头几拳。要不是领班临时有事走了，还不知要想出甚么鬼花样来折磨人哩。

日本资本家不但雇用了这些领班、东洋婆来欺侮我们、压迫我们，还用了一大批拿摩温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。这些拿摩温欺压工人的花样实在太多了，我这里也不去详细说它。反正，纱厂女工差不多没有一个不向拿摩温“烧香”送礼的。我们包身工没有钱送礼，怎么办呢？“石头里也能榨出三两油”，她们照样可以有办法剥削我们。她们可以剥削我们的劳力嘛！譬如，我在协隆纱厂做了四年多，就给我的拿摩温一家七口洗了四年多的衣服、被子、尿布，甚至给她家里人做鞋子、绣鞋花。洗好、晾干，还要大包小包地送到她家里，好象我就是她家丫头。所以，一到冬天，我一双手总是烂得像豆腐渣一样。

要讲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罪恶，我还必须提一提最可恨的“抄身制”。现在，我们工人上班下班，经过敞开的大门时，头上呼啦啦飘着红旗，大喇叭还奏着好听的进行曲，大家走路都是

昂首挺胸的。可那个时候啊，每天下班，都要走过一条铁栅栏的小弄堂，举起双手，忍受抄身的侮辱。那些抄身婆，把你从头捏到脚，你的发髻梳得大了一点，她非要你拆开来不可，你的嘴巴闭着，非要你张开来不可。要是有人被抄到了一团纱线或一小块布，那就要吃苦头了，有时，连性命也要保不住。有时，即使没有搜出什么厂里的东西，也要无缘无故遭到毒打。记得有这么一回，协隆纱厂一个三十来岁的女工来月经了，抄身婆却一口咬定她身上藏着纱线，要拖她到小房间里去解衣检查。那女工再三向她说明，也没有用。女工也很顽强，坚决拒绝到小房间去，抄身婆又堵住她不肯放。她后面的大批工人也出不去了。大家看了都非常气愤。有的男工便帮那女工说理，有的呐喊助威。抄身婆恼羞成怒，企图施出强迫手段来，那女工又气又急，索兴取出月经草纸朝她脸上塞去。这一下，可还了得！好几个“萝卜头”（日本人）一拥而上，把女工拖进了小房间，拳打足踢，只听得里面传出一声声穿心吊肠的惨叫。那批男工也被扣押了起来，当夜关在一间没有屋顶的房子里，让他们在刺骨的寒风里熬了一夜。至于那个女工，以后我就再也没有遇见过，也没有听到她的什么消息了。在那个吃人不吐骨的社会里，这根本就不算一回什么的哟！

我进了厂，便遭到了这一连串的灾难。唯一使我能感到一点温暖的，只有老工人们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。

厂里的老工人，对我们包身工是非常爱护的。他们自己日子也过得很苦，但看到我们没有吃没有穿、挨打受骂，总是千方百计地关心我们。象上面讲到的摇车头小四子，便是其

中一个。她待我最好，启发我的觉悟，生活上也很关心我，常常省小菜给我吃，送衣服给我穿。她有次问我：“这样的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呀？”我说：“命苦嘛，没有办法。”她瞪了我一眼说：“小孩子也说这样的话！哪有什么命苦命甜，是我们出头的日子还没有到哩！”我听说有出头的日子，心里乐了，追着问她：“这日子啥时会到来？”她说：“这日子不会自己来的。”我又问：“那么怎么才能叫它来？”她停了一停说：“你人大起来了，该多用脑子想想啦！”后来，她就教我们在生产上进行怠工。遇到夜班，东洋婆、拿摩温自己躲到角落里睡觉去了，小四子也叫我们在车弄堂里睡大觉，听任车子去开“梔子花”“白兰花”（车上断头多，工人叫“开花”）。她自己却站在弄堂里“望风”，一发现日本领班进车间，就把我们叫醒，并且帮我们接好头，做好清洁工作。日本领班走过来一看，车上地下都干干净净的，便又走开了。有时，小四子干脆把车子关掉几部，弄得一个夜班都落不到几落纱，日本资本家也不会发现。只有一次，日本领班突然半夜来查车间，看见有三部车子关着，便追究起来。我心里想，这下糟了，要是给查出来，小四子还有命吗？不料，小四子自己一点也不害怕。她挺身站出去应道：“是我关的。”日本领班气势汹汹地责问她：“为什么关车？”她不愧不忙回答道：“车上没有油了，婆司都在冒青烟，不关掉，怕火烧哩！”那时的机器保养工作本来是很差的，日本领班查了一下机器，发现果然油不多了，便也无话可说。日本领班走后，小四子抚摸着我的头笑道：“没有啥可怕的，看见吗？”我当时年纪还小，不懂事，事后想起来才知道：这就是斗争。于是我才懂得她说的

“出头的日子不会自己到来”，是什么意思了。

### 小姊妹們

我的技术渐渐熟练起来了，工資也稍微加了一点，可是这对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因为我们的一切都是不属于我们自己的。我们拿到了工資，只有从工厂带回来全部交给包工老板的份儿。

每逢“关餉”的日子，老板早就搬了一把藤交椅，跷起二郎腿，坐在家门口等我们了。这是他最“和气”的时候，一看见我们放工回去，他露出了稀有的笑脸，把手伸出来一摊：“今天关餉了？来！”我们只好把全部工資，连同“号头纸”一起放在他的魔爪子上。他叮叮当当一数，說声：“嗯，沒有錯，进去吧！”顺手把銀元丢进身边的箱子。那箱子一会儿就白花花地装满了。老板家里一共有百四五十个人吃包飯和带飯，一关餉下来，就有两千块钱的收入，怪不得他手头越来越闊气了。他用敲骨吸髓剝削来的血腥錢，一天到晚过着荒淫无耻、花天酒地的生活。他常常通宵达旦在外面嫖賭，成了輸不完、賭不穷的大財主。有一次，他賭得手上的八只金戒指都不见了。第二天我们关餉，于是那八只戒指又立刻回到了他的手上。

日本資本家发财了，包身工老板养肥了，我们包身工的血也被吸干了。我们小姊妹中间十有九个生干血癆，好几个和我一同从乡下出来的小姊妹被活活折磨死了。死了一个包身工，就和死了一条狗一样。家里有人的，老板就去一封信叫出来領尸，还說：“領出来是一个，交还你的也是一个！”沒有家属来

領的，就找條破席一卷，丟在楊樹浦的亂墳堆上喂野狗。

還有些包身工，是活活被老板的皮鞭抽死的，說起來更慘了。

跟我一道出來的小姊妹中，有個叫徐桂英的，年紀比我大幾歲，人也長得比較漂亮。她每天上班下班，路上常有不三不四的流氓要調戲她，攔住路跟她說話，有次桂英沒有法子避開，只好應付幾句。老板看見了，硬說她是“軋餅頭”，想跟人逃走。當天晚上，使用繩子把她捆起來，用皮鞭抽打。還叫我們大家都跪在地上陪打。老板一面打，一面罵，打一陣，罵一陣，鞭子的唿哨、淒厲的慘叫，象一枚枚釘子釘進了我們的心，可惜我們那時候都不懂得團結反抗的道理，只好流着眼淚，望着自己的姊妹受罪受苦。心毒手辣的老板把桂英打得奄奄一息，到第二天早晨四點鐘才住手。我們把桂英衣服解開一看，渾身皮肉都象紫蘿卜一樣，身上突出了一塊東西，是一根胯骨給打折了。天一亮，老板又來逼着她去上工，還說：“別給我裝死，死也死到外面去！”我們把桂英背到廠里，日本人看見她已不能做工，連廠門都不准她進。我們只好把她放在門口，等放了工，又把她背回工房去。桂英這時連動也不能動了。老板看見桂英已經變成這副模樣，再也不能給他掙錢，便不讓她住下去。我們說：“她骨架子都塌了，叫她上哪里去呢？”老板說：“哪里去？討飯去！”當天晚上，他就不准桂英吃飯，第二天又趕着要她出門。我們幾個小姊妹商量了好久，也不知道怎樣安排她。最後，不知是誰想出了一個主意，說是永安紗廠旁邊，沿河岸有十來只泔腳缸，要是把桂英安置到那邊去，她即

使不能走路，肚子餓時還可以伸手撈到點泔腳充飢，不至於馬上餓死。我們想來想去，再也沒有別的法子了，就只好這麼辦。我們在兩只泔腳缸之間鋪了些干草，頂上也用兩根竹竿架了個棚棚，蓋上几把草，給桂英遮遮太陽和雨水。——雖說不大管用，總比一點不遮要好。過兩天我們又分頭給她弄了一隻飯碗和一雙筷子。筷子是“分工”給我弄的，但夏天穿的衣服單薄，懷里兜了雙筷子，被老板娘一眼看出來了，結果是挨了一頓耳光。後來還是由另外一位小姊妹想辦法拿出去的。

可憐的桂英，在泔腳缸旁邊躺了整整兩個多月。天氣越來越熱了，她的傷口上生了蛆，我們只能抽空去照顧她，眼看着她傷勢一天比一天惡化，眼看着她一陣陣地昏迷不醒，沒有一點辦法可想。桂英自己也知道好不了，一天到晚只想著她故鄉的爹娘。我們也很想讓她回去和爹娘見上一面，可是上海和蘇北隔著一條寬闊的大江哪！廠里的老工人告訴我們，虬江碼頭那邊，可能有蘇北來的民船，於是我們又常常利用星期天跑去打听。問來問去，最後总算找到了一位好心的船老大，他听了桂英的遭遇，答应把她帶回去，我們把桂英送上了船。可憐的桂英，回到家里不上二十天，就悲慘地死去了。

象桂英這樣被活活打死的姊妹，在我們工房里又何止一個、兩個！我們的工房里有一百多個包身工老板，每一個老板都是不打人、罵人就過不了日子的惡魔。所以，睡在工房里，差不多每天都能聽到有人哭喊，有人嚎叫。那時候的工廠，好比是一座活地獄，我們工房，又何嘗不是一座活地獄？其實，過去那個社會，整個就是一座暗無天日的活地獄呵！

## 逃 跑

这样的日子，我一天又一天地熬过来了。熬满三年，按照契约，老板应该付给我五十块包身银，同时，我的工资收入应该归我自己所有了。但是，黑心的包身工老板怎么肯轻易放手呢？只要我们身上还有一滴血，吸血鬼是决不会放松的。当我三年期满的时候，老板跟我算了这样一笔账：我刚来上海，头上五个月没写上号头，没有给他挣钱，所以要扣掉不算。另外，我平时生病停工，要按“停一补三”的老规矩补偿，共需要补给他六、七个月。这两笔账加起来，我还欠着他一年的人工呢！既然我没写上号头，以前的五个月没给他挣钱，这五个月的伙食费就要由我自己负担。五个月的伙食一齐加起来，那五十块钱恰好扣光。这样，我给老板做了三年，不但一文包身银不会到手，相反，还欠了他一年人工的债呢！请想一想，这是一种什么算盘啊！

于是，我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如果我还想活下去，除了从老板家里逃走以外，是没有别的生路了。后来，我便下了逃出魔窟的决心。和我一同逃走的还有两个小姊妹，我们先把衣服偷偷地拿出去，放在一个熟识的老女工家里。为了怕老板到码头上追我们（过去有些逃走失败的小姊妹，都是从码头上被追回去的），在离开工房以后，秘密住在那位老女工家里，过了三天，才上轮船回家乡的。

但是，和我一道逃走的两个小姊妹，到家没多久，都先后生干血癆死了。我自己也生了一场重病，整天干咳。我离家儿

年，身子不但沒有长高，反而比以前更瘦了。我爹到处給人打短工，做泥水匠，掙几个錢給我調养，才保住了我这条性命。

我侥幸逃出了資本家、包身工老板的魔掌，但我的苦难經歷，並沒有到此結束。后来，我仍不得不到苏州、上海来做工，仍旧受气受苦。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，我才真正跳出了地獄門，照见了太阳光。

### 出头的日子到来了

上海解放的时候，我已經在现在的国棉十二厂工作了。

和别的紡織厂一样，十二厂里过去也有許多包身工老板。解放以后，人民政府便彻底取締了包身工这个罪恶制度，那些罪恶重大的包身工老板，逮捕的逮捕，法办的法办，一个个得到了应得的惩处。有罪行的拿摩温，也都在民主改革中給斗倒了。我看到十二厂的包身工老板被处理了，便約了几个小姊妹跑到我从前当包身工的协隆工房去。一走进工房，有些老熟人便围上来向我們报喜訊：那个姓刘的包身工老板已給抓起来了，我听了，心里真是高兴，我于是想起了十几年前小四子对我說过的話，我們穷苦人出头的日子終於到来了。我感謝共产党和毛主席領導我們获得了解放。

解放以来，我們紡織工人的生活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要我一样桩来讲新社会給我們带来的好处，实在沒法子說得完。現在我們常常讲“回忆对比”，依我說，旧社会和新社会，一个是地獄，一个是天堂，比也沒法比啊！

解放了，我們工人处处感到自己成了国家的主人。別的

不說，过去每天出厂象过鬼门关，要排着长长的队伍，忍受抄身的侮辱。解放以后，这个制度立刻就取消了，工厂门口那道弯弯曲曲的铁栅栏也被拆掉了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取消抄身制那一天，工厂门口装饰得喜气洋洋，我们在锣鼓喧天声中，合着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……”的拍子，挺起胸膛走出敞开的大门，一颗心激动得象要跳出来一样。许多老工人那天都手挽着手，穿过红旗，在门口进进出出地走了好几个来回，嘻嘻哈哈地大声说笑，一下子变得象小姑娘一样年轻活泼了。

我们是国家的主人了，工厂的生产也由我们自己人管理了。党和国家从工人中间提拔了大批干部，担任了党委书记、厂长、工会主席、车间主任……过去那一套压迫工人的管理方法，都被迅速地废除了。我自己也从1952年开始，担任生产小组长。我们工人享受着充分的民主权利。我们纺织女工，不但在工厂里当家作主，而且还派了代表管理国家大事，我们车间里有个同志，就是上海市的人民代表。这样的事，过去是做梦也不会想到的。

我们国棉十二厂，过去是日本资本家开的老厂，机器也都是老机器，但解放以来，经过几次大规模的技术改造，这些老机器也和我們工人一样返老还童了。国家又特别注意改善劳动条件，增添了许多通风设备，装置了冷冻机，现在的车间真正是冬暖夏凉。我们工人也拿出了最大的能力，千方百计为国家纺出更多更好的纱来，所以生产一年比一年增加，质量也一年比一年提高。现在我们厂出的纱布，不仅供应国内市场，

而且还出口到許多国家。

随着生产的提高和国家整个經濟建設的发展，工人的生活也一天天好起来。过去我当包身工时拾柴禾的荒地和田野上，造起了一排排的工人住宅，我的家现在就住在工人新农村里。厂里，食堂、浴室、图书馆、托儿所接二连三办起来。工人生了病，可以到医院里去看，而且可以享受劳保。我曾經在1956年生了一场大病，停了两年工，鈔票花了一千多元。要是在从前，我生了这样的病，哪能停工两年，还花得起一千多块钱呀！我一次又一次地拿这一笔賬，和从前包身工老板跟我算的賬对比，总禁不住流出眼泪来。

现在，我有三个孩子，大儿子是解放那年生的，现在已經讀初中二年級了，二小子今年暑假就要小学毕业。第三个是女儿，也已經上小学二年級了。我常常拿自己的童年时代和他們对比：当我才象小女儿那么大的时候，已經起早摸黑地給地主割猪草，下田干活了；当我才象二小子那么大的时候，已經跟着包身工老板到上海来了；当我象大儿子那样年齡的时候，我正在挨日本資本家的皮鞭、包身工老板的皮鞭……。

我是生产小組长，并且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最近车间里陸續来了不少新工人，她們都是有文化的青年，一进厂，就有老师傅手把手教技术，领导和老工人都真正把她們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。看着她們跳呀、唱呀，一天到晚乐呵呵的样子，我不免又想起了自己的过去。所以，我一有机会就要唠唠叨叨給孩子們、給青年工人讲过去的事情。我要让他們知道，工人过去的生活是什么样子；让他們知道，是共产

党、毛主席，是革命，给我们带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。我还要  
尽情地高呼：中国共产党万岁！毛主席万岁！

（赵 自整理）

# 苦海底层十五年

上海国棉十九厂老工人 孟月珍

“一进吴淞，欢乐天堂；  
进了工房，虱子扁郎（臭虫）；  
回声一响，就进工厂；  
进了工厂，眼泪直淌；  
在马路上，就想爹娘。”

这是当年包身工常唱的一首歌谣，每当我下意识中哼起这首歌谣时，惨痛的往事又出现在我的眼前。我现在已是个老年女工，在纺织厂里前后干过三十个年头，其中前十五年是在旧社会牛马生活中度过的。

每当我想起那些日子，尤其是当包身工、遭受敲骨吸髓地压榨的那些血腥日子，仇恨就会象大海洋里的浪涛一样在我胸中翻滚，久久不能平静。这篇辛酸血泪史，我不但自己毕生不能忘记，还要时时拿它讲给年青的一代听。

## 糠菜十二年

我的老家在江苏泰兴，家里地无一分，房无一间。父亲当

长工，每天顶着星星上地主家，出工前要先挑水、泅猪圈、浇菜园，天黑收工后还要洗碗、涮锅、出灶灰和洗切猪草，回家总是夜深了。但是累死累活，一年的工钱只有夏熟的二斗麦子和秋熟的四斗高粱。由于这户地主租给了我家赖以藏身、活命的两间破草房和三亩薄地，因此虽然受尽剥削，父亲也不敢换个东家。

我到六、七岁，就开始依靠一双小手，帮着母亲养家活口了。农忙季节，母亲到地主富农家打打短工，除麦草、点豆子、刈麦、挑麦，有啥做啥。地主说女人不顶事，只给饭吃不给工钱，母亲就省下一碗麦饭，用围兜装回来，喂养三个弟弟。农闲时候，母亲替人洗衣裳、纳鞋底，挣几个铜板。我有时给地主家放猪，讨点剩饭残粥吃吃，有时背着大筐到河边、坟堆去挑挖野菜、猪草、骡草。我穿着破烂的棉袄和没有后跟的破鞋，伸着冻裂出血的小手，在寒风中挖呀挖，手冻僵了，就拱着袖筒蹦跳一阵，接着再挖，挖不满筐，就不回家，因为一家靠它活命哪。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的一大筐猪草，能从地主婆手里卖到三两个铜板，一筐骡草也可从磨坊换回斤把麸皮，野菜自己吃，有时挖得多了，就晒干藏起来。有了这些，遇到阴雨天找不到活做的时候，就能够烧锅薄水汤来糊糊口了。

这样混过了许多年，一家都是皮包骨头、面无血色，我长到十二岁，人家还不信我满了十岁。

我们全庄几百户人家，除了几个高墙大院里天天肉香饭白外，其他都和我家差不多，甚至还有比我家更苦、更惨的。正因为这样，上海一些纱厂包身工老板，才能年年从庄上招去

許多小姑娘。

我十二岁那年，从上海来了个姓龔的包身工老板。他成天笑咪咪地在有小姑娘的人家轉来轉去，尽說到上海做洋紗厂怎么怎么好，住的是楼房，吃的是米飯。

这老板是个有經驗的老手，过了两天，他见人心已被說动，但还犹豫不决，就故意厌恶地用手捏弹弹我們盛着糠菜的粗碗，对大人說：“唉，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啊？老吃这个，就能养大她們嗎？”接着他又笑嘻嘻地說：“我是有家有业的人，你們放心好了，小姑娘跟我去，吃的住的，外帶学手艺，都包在我身上。包四年工，家里可以拿到四十元白花花的洋。”

庄上困难的人家本来就多，再經他油嘴滑舌翻来复去地說，开始有人在他写好的紙上画押，把小姑娘交給他了。起先，我父母不放心，但是挡不住我糾纏，他們想想也对，反正家里养不活我，不如放我一条活路。爹說：“好吧，你要去就去吧，爹也不希望你这好那好，只要能混上一口飯，混大你自己就行了。你要去就去吧！”

那包身工老板听得說，就拿出一张写好的字契，叫我爹画上十字。画好之后，他又說：“本来要付你几块錢定洋，可是这次要跟我去的小姑娘太多了，怕盘纏不够，以后一总寄付吧！”

第二天，我第一次离开了用糠菜喂养我十多年的故乡，怀着有飽飯吃的梦想，登上了駛往上海的輪船。和我同行的，还有庄上另外十一个小姑娘。

在船上，我們十二个小姑娘統統挤在貨艙里，住在艙面上房間里的老板，不时来张望我們一陣。船越走越远，老板的話

也越来越少，好象他的話在前几天讲光了；臉也越来越板，好象那副笑臉甩在庄上沒有帶上船來。

### 苦海底层

到了上海，我們並沒有看見什麼洋樓工房，只有一間間低狹的房間，里面連床也沒有。我們住的一間，長約十二、三尺，寬十尺多點，緊挨兩邊牆腳，各攤了三條三尺多寬、五尺多長的蒲席，每條席上堆着一條破棉被。老板說，四個人一張席，日夜兩班共是八個人輪流睡。這間“鴿子籠”里，每班竟要塞足二十四個人！他還鉄板着臉交代了一通規矩，說什麼吃他飯要受他管：不准單獨出去，出去了就要打；不准和生人搭訕，不然也要打；……。我們已好幾次聽到先來的包身工在窃窃私議：“‘閻王’回來了，當心點！”

後來，老板領我們到日本資本家開的上海紗廠第四廠（就是現在的國棉十五廠）等處去寫號頭。事先，他給我們每人發了一套花衣裳，不夠時還把帶飯工當中稍為象樣的衣裳借了來用，同時拿出一盒胭脂來，硬叫大家塗抹一陣，說是日本資本家歡喜漂亮的。我們糊里糊塗地跟着他跑了兩個廠，經過一番盤問，其他十個小姐妹都寫上了號頭，只有我，廠里嫌小不要。老板雖然再三爭辯、賭咒，說我已滿十五歲，但仍是沒有寫上。

回到“家”里，老板叫我們脫下穿去寫號頭的新衣裳後，就惡狠狠地罵我：“你這個賠錢貨，帶得你來是倒了楣……。”直到罵夠了，才又說：“你沒有寫進廠，就在家里好好做事，做不

好，你就不得过！”

从此，我就做了包身工老板家里的丫头。

每天一早三点多钟，老板娘就叫我起来拉风箱，烧早班包身工的稀粥，烧得慢了点，不是扯头发，就是敲“麻栗子”（栗暴子）。等到早班姐妹端起照得见人影的稀粥，嗦噜嗦噜紧喝的时候，我得赶着洗涮六、七只大小马桶和老板家的一套高痰盂，常常不等涮完，老板娘又在喊叫了：“还不死得去洗尿布！”

到了六点钟，老板娘梳洗整齐，甩着手上菜场时，我就挑着两只大篮子跟在后面。老板娘贪便宜，买给包身工吃的都是没有人要的垃圾菜，因此，她总是在菜场上兜来兜去，这里买一捧臭咸菜，那里买一堆霉豆渣，最后，花上三、五个铜板，把菜摊上卖剩下的十几斤黄边老叶一扫光。有时没有这种机会，只好买些两个铜板一斤的青菜，但是，菜心是归他们自家吃的，只把老边叶子烧给我们姐妹们吃。

等我回来把菜洗切舒齐，已经九点来钟，连夜班回来的姐妹也吃过早饭睡觉了，但没有人管我吃过没有。起先，我不知道自己的早饭在哪里，去问老板娘，谁知她扯起怪眼说：“在哪里？在桶里！”

“她们吃光了呀。”我鼓起勇气来说了一句。

“我不信她们吃得这么干净，你刮刮看。”不知道什么时候，老板的娘站在我背后插上了嘴，顿了顿又说：“快刮快吃快收拾，我要打麻将牌了。”这个瘦老太婆是来催我去给她捶背的。

于是，我每天的早饭，就是从两只空粥桶里刮下的一、两碗又象米汤又象薄浆糊的桶脚。这些沾满灰沙的桶脚，夏天

还密密麻麻地爬滿了蒼蠅。

吃中飯和晚飯的時候，老板家魚肉滿桌，我就站在桌邊給他們老老小小添飯。侍候好他們，再忙姐妹們的飯食。之後，又是在收拾碗筷的時候，刮點姐妹們的剩飯充飢。

瘦老太婆吃飽了飯沒有事，成天打麻將牌，逢到打牌，就叫我站在後面給她捶背，稍不合意，回身一掌或是當胸搗几拳，常打得我滾倒在地；但還不准哭，不然她告訴老板，就會招來更加厲害的毒打。瘦老太婆打牌常常打到晚上八、九點鐘，可是她睡覺還不放過我，要我在床邊上給她捶腰捶腿。勞累了一天，我捶着捶着就垂頭打起瞌睡來了，碰到這種時候，她就伸着鷹爪般的癆手，扭我的眼皮，扯我的頭髮，噤噤咕咕地罵道：“小×，我還沒睡你倒睡了，快捶！”

我常常驚恐地看着這雙干癆的手，不知道它究竟會翻出多少折磨人的花樣，久而久之，我見了這雙手就害怕。但是，儘管這樣，瘦老太婆還覺得不夠。一天，我蹲在腳盆邊上給她洗腳，她嫌燙，就順勢翹起濕淋淋的臭腳蹬我的臉。她看着我跌倒在地上用手背擦臉，還不住地嘯嘯發笑。

每夜，我總得十一、二點鐘才能摸回“鴿子籠”去，找個地方睡覺。由於鋪少人多，自从我当了头起，就沒有鋪位了，總是拱到哪裡算哪裡。有時，我擠到瘦些的姐妹當中搭個被角睡一夜，因為被子小，睡在兩邊的姐妹自己也蓋不周全，所以我更多的時候，是擠在走道的空隙里蓋着自己的棉襖睡。有時，我看姐妹們擠得嚴严实實，就靠在門邊不進去；當時姐妹們爛腿的特別多，常常一個姐妹翻身不小心，碰痛了身邊另一

个姐妹的烂腿，使得她忍不住痛哭起来，这样一来，就会吵醒许多姐妹，大家坐起来，想到苦楚，一齐悲伤呜咽。这被睡在对门亭子间的老太婆听见，又会遭来一顿臭骂。因此，我很怕挤痛她们，宁可睡在门边地板上。常常是这样，等到我找好睡处，合上眼睛不一会儿，老板娘又叫我起来烧火了。这样，我一夜有时只睡上三个多小时。

进了厂的姐妹们，日子并不比我好过。她们每天在厂里被资本家、领班、拿摩温折磨了十二个小时以上，筋疲力尽地回来，还少不了被差东差西。象天寒下雨，老板两个大儿子早上上学，总是由夜班回来的姐妹背去。他一家十几床被褥，都是叫姐妹们在星期天拆洗。此外还得遭受老板各种兽性的折磨和凌辱。

一个比我早来三年的同庄姐妹张宝儿，脚上烂疽，脓血不断已有两年多了。她娘赶来想带她回乡下去医治，讲明医好了再来，要补工就补工。但是老板根本不听，还拿出一本厚厚的帐簿，算盘珠一拨：什么来上海时的盘缠啦，初进厂工资小亏下的饭钱啦，给拿摩温送的礼啦，还有因生病停工该罚的补工天数啦（停工要罚三工）……结果，他算出张宝儿欠下了他还不清的“债”，就这样把张宝儿的娘逼了回去。张宝儿只得继续一瘸一拐地替他卖命，腿越烂越厉害。

有个大姑娘，包工期早就满了，老板还是不放她，硬逼她继续在那里当带饭工。后来，她结了婚，要求搬出去住。老板趁她男人一时没能写进厂的机会，竟叫小流氓在马路把他打得半死，还说：“识相的早点滚蛋，下次再碰到就要你的命！”

第二天，她男人就被老板軟硬兼施地赶回乡下去了。

老板还强奸了一个包工期滿的兴化小姑娘，这个小姑娘原在乡下訂了亲，男家曾几次来信催她回去結婚，可是这个万惡的包身工老板硬逼她留下做带飯工，一边繼續供他吸血，一边供他随心所欲地污辱、玩弄。逼得那个小姑娘寻死觅活、痛不欲生。

老板根本不把包身工当人，包身工的死活对他来讲是无所謂的。有个小姑娘本来瘦弱多病，由于月經期間接連几天淋着大雨进厂，得下重病，又黄又瘦，老板还是每天赶她去上工。最后，她起不来了，紧閉牙关，滴水不进，老板才让人把她抬走，不多天听說就死了。

还有个重病的小姑娘，也是被迫天天拖着病体去上工，日复一日，已是奄奄一息了。但是，老板还是天天早上来掀被子赶她去上工，稍迟一步还要挨他鞭抽脚踢。一天早晨，老板看她还蒙着被子，就怒气冲冲地吼道：“还不死得起来去上工！还要老子天天早晨来請？”但是，罵了还不见她动。老板更加怒不可遏了，走上前去朝被子底下踢了两脚，大罵：“装什么死，快起来！”但是，打了也还是不动。及至掀开被子一看，原来她早已死了！

目睹这样的惨象，姐妹們无不失声痛哭。

我在这包身工老板家做了一年，本来单薄的身体，更加瘦弱得不成样子了。我漸漸感到，老板很乐意用我这样一个連整頓飯食都不必花費的丫头，因此，根本不打算带我进厂写号头了。就是进了厂又怎样呢，許多姐妹的遭遇，早已叫我胆战

心惊了。于是，我开始日夜梦想脱离这个苦海，回到家乡去。

### 哪里是生路

春节边，庄上的孟二叔来看他那和我一道出来的女儿，同时还受托带来三个小姑娘，给我们老板做包身工。这是因为乡下日子困苦，他们又不了解包身工生活的真相。

孟二叔乍见我时，竟吓了一跳，说：“你是月珍吗？”我二话没说，一把拉住他的衣袖，哭着向他说：“二叔，带我回家吧，再下去就没得命了！”他问明了情况，也心酸地说：“别哭，别哭，我来想想办法。”当天他就去找老板，可是老板听后，却讲：“回去？便当，拿饭钱来！”孟二叔指着我说：“月珍看来不行了，难道你硬要把她拖死在你这里吗？”老板沉吟了一下，想到孟二叔的女儿还留在这里，这次又带来了三个小姑娘，这时不便太暴露凶相，才说：“好，我卖你这个交情！”二叔的女儿比我壮实些，已经写进了厂，再说乡下生活也实在困难，因此他强忍住心疼，把自己的女儿留下，才把我救出了魔窟。同去的姐妹见我要走，送我出门时，都扑簌簌涌出了眼泪。

第二天，我就随孟二叔登上了轮船。回想年初乘船南来，相隔不过一年，却象捱过了一世。

一进家门，我娘看着我一身破破烂烂的旧棉袄，一头虱卵结并的头发，蜡黄的瘦脸，失神的两眼，惊得说不出话。歇半晌才哭出声来。我爹闻讯赶来，一边红着眼睛，一边劝说：“别难过了，别难过了，回来了就好，快给她清理清理吧！”

家里多了我一张嘴，更困难了。娘好几次焦急地讲：“孩

子呵，家里日子也难过啊。”其实，她就是不讲，我也早看出来。自从我回来，她老是熬夜做鞋。两夜赶出一双，赚了六个铜板，也只能买半升碎米，哪里填得饱几个肚子。我听着几个弟弟餓得哭叫的声音，心都碎了。我睡了几天，勉强能起来，就又领着大弟弟出门去挑菜、割草。依旧是野菜自己吃，猪草、騾草去換錢。肚里沒食，身上衣单，冒着料峭春寒低头挖呀挑的，常常眼前一陣发黑，跌倒在地，弟弟惊得又哭又嚷又是推搡。当我醒过来，給弟弟擦眼泪的时候，却常常自己忍不住了，結果，姐弟二人就抱头痛哭起来。

这样过了几个月，到二三月里，落了一场尺把厚的春雪，久久不化，麦苗都在烂根。真是破屋又遭連夜雨，一家人都成天为三亩地的租子焦心。

地主租給我們的都是瘠地，产量不高，一熟每亩只打得担把粮食，按三七开，不管收成好坏，每亩要繳七斗租子。如果欠下租，那就按对半利往上翻，因此，誰要是欠开了头，就不要想还得清。象庄东头挑水的周四儿，他老婆帶了个儿子在家租种一亩半地，有一熟欠下一担租子，結果利滾利，每年收了全部还債都不够，只好一边討飯一边种地。正是看到了这种情况，我家从来不肯欠租，宁可自己多喝薄水湯，总要把租还清。但是，春雪烂苗，一半收成也难保，怎么繳租呢？

越近麦收，爹媽的眉結打得越紧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从上海又来了个包身工老板。这人姓黄，是江阴城的大地主。他打听到我家的情况，又来劝說我娘。他說：“这个小姑娘是可以写进厂里去的，东洋厂进不去，中国厂保险进得去。”我娘回他：

“算了，我女儿刚从上海回来，苦得沒命……。”

姓黄的听了我娘說完关于龔老板的情况，拍手打掌地讲：“那个老板黑良心！我家的小姑娘可都是又白又胖，蛮活絡的。一天到晚粥飯随便拣，星期天有鱼肉葷腥，高兴还下下面条。我家小姑娘多，专门有三个烧飯师傅，小姑娘下工回来，事也不用做。我脾气好，老板娘也好。你們尽管放心，只要一滿包身期，小姑娘就可以給家里捐工錢了。”

听他这么一說，我就想：也对，世上人是有好有坏的，也許这个老板是不错。再加上租米迫在眉睫，家里少一张嘴就好得多了，有点心动。誰能想到天下老板是一样的黑心呀！

姓黄的看到我們被他說动了，就讲：“我的包期是五年，每年年底寄給你家十元，你們就可以淨得五十元。怎么样？”

吃了近半年的野菜，我明白了家乡虽然是出产大米、小麦的地方，但是却沒有我的口粮，再看看身边瘦弱的母亲、弟弟，知道多我一张嘴，他們就只能更加瘦弱下去，于是咬了咬牙对母亲讲：“娘，我还是去吧。”娘沒有作声，只是点了点头，两颗豆大的泪珠唰地滚落下来。

我从魔窟逃回来刚刚半年，又被迫第二次离开了家乡。这次上船沒有别的梦想，只是巴望能进中国紗厂，并暗祝这个包身工老板比上次的好一些，同时也下定决心，这次不管怎么苦，也要好好熬下去，绝对不再回来拖累父母。

## 工厂内外

黄老板家大业大，有两处工房，一处是在沪东日本大康紗厂

(现在的国棉十二厂)边上,关了一百多个年龄大的小姑娘,他自己的家就在那边,并且兼营一斤粮油铺子;另一处在沪西一月中国资本家开的工厂附近,关了六、七十个年龄小的,由他的亲眷“针线老太婆”掌管,逢到关餉,他或是他老婆和小舅子才去一趟。

我先到沪西。一进工房,就听先来的姐妹讲:“可怜,你们也给捉到籠子里来了。”我奇怪地问:“老板不是蛮和气的嗎?在船上还买飯給我們吃呢。”姐妹讲:“他是阴死鬼,面善骨子坏。装模作样不打人、不罵人,有了好名气可以多招到包身工呀,但是他尽在背底里使坏,凡是恶事都由他的老婆和小舅子出头。你看着好了!”

老板的小舅子姓沙,也是个有两处工房、近二百名包身工的老板,两处工房都和我們老板的貼隔壁,两家狼狽为奸、相互照管着。我到的第二天,就見識到了他的狠毒。那天,一个包身工到附近大自鳴钟去轉了一轉,回来就被他吊在橫梁上用皮鞭抽打,同时恶声罵道:“家有家規,国有国法,叫你們不要乱跑,你偏跑,看你可舉得过我的鞭子!”直打得那姑娘昏死过去,他还說:“会死嗎?用冷水灌一灌就好!”

姐妹們看到我害怕的样子,就讲:“你当心点,不要有什么把柄落到針线老太婆眼里,这里的人挨打,都是她告的状。”于是我小心謹慎,唯恐出錯。但是不到一个月,她还是在老板娘面前告我一状,說我依仗烂脚,不帮她倒马桶。老板娘就凶神恶煞般地逼我跪下,还没等我弄清因由,她就拿着針线老太婆的竹尺,沒头沒腦地打来,还嘍哩呱啦地罵:“慣得你!工錢大

的小姑娘，放工还搶着做生活哩，我們貼着你吃飯，你連马桶都不肯倒啦，这样下去还了得！”

尽管老板在乡下吹得天花乱墜，但是我們过的日子，和在前个老板那里并没有什么不同。早晚两頓清湯光水的稀粥和一罐臭咸菜或生蛆的豆腐渣，做日班带一小盒紅糙米石子飯和一点烂青菜进厂当中飯，做夜班白天要睡觉，就連中飯也沒得吃。

我們住的也和前个老板那边一样，一間又低又窄的“鴿子籠”里，要塞足二十多人，四个人一床被子，日夜两班輪流盖，因此根本无法拆洗，又脏又臭又硬。夏天光身睡地板，汗貼汗，脓滾脓，脓头痱子和疥疮人人都有。再加上滿墙滿地的臭虫、跳蚤，咬得我們身上沒有一块好肉，不是长条的血疤痕，就是大顆的脓疮头，自己看了也害怕。厂里有一个小小的洗澡池，个把星期开放一次。几千个脓血遍体的姐妹輪流洗，水也不換，腥臭难当，象阴沟里的污浆一样。我第一次去还不敢下水，但是不洗又怎么办呢？只好相信了姐妹們自己安慰自己的話：“只有人脏水，沒有水脏人”，硬着头皮去洗了。結果，我当了十几年包身工，就害了十几年疮。

在厂里被折磨了十几个小时，回到悶热和充滿汗臭、烂肉腥味的房里，怎么睡得着呢？我們常常在被咬得不得过的时候，坐起来談談哭哭，混过一夜。

我們穿得更象叫化子一样，老板每年最多只发一套单褂褲給我們，成天指着它穿，雨淋、汗漬、机器磨，不多久就破了。老板娘还罵：“懶鬼，勤洗洗呀，这么快就烂了！”不是我們不洗

呀，是沒有替換的衣服呀。脏透了，我們就湊个好天气，把棉袄里的棉花抽掉当夹衣穿上，換下单衣来洗。老板是不发棉袄的，我們也不敢多穿。就这样子，从乡下带来的那件棉袄已經补釘連补釘，不知道原来的布是什么顏色了。至于鞋子更不用談，無論是下雨下雪，都是一双百孔千疮的烂布鞋。老板每年只发一双旧布鞋，成年累月在煤屑路上走，那里够？我們只好向厂里本地工人討双把旧鞋，或者到垃圾桶里拾一些破鞋，拿回来洗洗干淨，連連补补穿起来。因此，我們常常穿着两只不同的鞋子上工，別人觉得可笑，但是我們却当它宝贝呢。一天，放工碰到大雨，我舍不得将一双刚补好的破鞋踩湿，打赤脚走回来，結果烂脚里嵌进了許多湿煤渣，一步一个血印，痛彻心肺。实在熬不住了，回来一头倒在地鋪上。老板娘见了就罵：“小×，装死，又要睡了！”我看她拿着板子来打我，就辯解道：“我烂脚痛……”她不等我說完，連声吼叫道：“为什么不到自来水下去冲？快去！”我被逼得掙扎到自来水跟前，刚一开龙头，就象万針扎心，晕死过去。第二天，还是照样逼着我上工。

初进厂，我在細紗车间学挡车。当时，資本家給刚进厂的包身工工資，只有成年工人的三分之一，却要我們很快就能跟成年工人一样干活，因此負責教我們的拿摩温非常厉害。不管什么动作，总要求一教便会，不然拳打脚踢、扯头发、扭眼皮，什么都来。一次，我学接头，接了几次沒有接上，正好資本家走来，他站在大弄堂看了一会，就板着脸走了。拿摩温气急敗坏地罵我給她丢脸，她越罵，我越慌，还是接不上头，于是她

抓住我的手指，用力按在飞轉的齿紋罗拉上磨，一会儿，鮮血就順着手掌心滴得机台、地上都是，她看见我大哭大叫，还順手打我两个嘴巴。

那时的机械落后，沒有吸棉管，断头花缠在絨棍上，时间一长，缠滿了白花的絨棍就会掉下来，打断更多的头，常常弄得我們在车弄堂里手忙脚乱。这时如果碰到拿摩温走来，就倒楣了，她站在车头边，不管是木棍或粗紗筒管，抓到什么擲什么，一定要擲得我們头青脸肿才住手。

拿摩温終究是女的，力气有限，如果碰到領班就更苦。有一次，我的烂脚发肿，动作慢，上马桶間来晚了一点，多断了几根头。早就等候在车头边的領班，問也不問，抓住我的头发一甩，跟着一巴掌，打得我仆倒在地上。

我在这里做了两年光景，又轉到大康紗厂。

大康厂是引日本紗厂，許多日本領班成天趾高气扬地在车间里轉，一个不称心就用穿着皮鞋的脚踢人。当时，厂里吃飯不关车，我們把飯盒放在车肚里，偷偷吃几口，又放下来接几只头，总是两口飯还没有下肚，飯面上已是厚厚一层花衣。一天，正当我蹲在车边往嘴里扒着沾滿花衣的飯时，忽然一只穿着皮鞋的脚踢飞了我的飯盒。我抬头一看，一个凶神恶煞般的日本領班正嗚嚕嗚嚕罵我不該在车间里吃飯。

日本領班走后，几个担任落紗的老工人跑来安慰我。老阿妹还拿来自己的飯盒，說：“月珍，不要难过。我帶的飯，你吃了吧。”老阿妹是浦东人，常常帶些自家种的青菜蘿卜給我吃，但是，看着她自己帶的飯也很少，我怎么也不肯要。她就

拿起我的飯盒来往里一倒，說：“还客气什么呀，大姐姐是沒有，要有呵，还巴不得天天帶給你一点呢。看着你們包身工这样苦，真心痛呵！”另一位大姐也讲：“月珍呵，我們每一落紗，总有十几分钟的空隙，以后我来替你挡几分钟车，你安安心心到皮带后面去吃飯吧！”我凝視着这几位大姐姐，心里升起一股暖意，刚刚挨打时忍住的眼泪，现在却象开了閘门一样地涌了出来。

日本領班根本不把中国工人当人，要我們象牽磨的驢子一样，不停脚地围着机台轉，一看见我們停下来就有气。一次，我的烂脚上沾滿了花衣，痒得就象有虫爬，我刚刚立定下来翘起脚打算拈除时，被一个日本領班看见了。他咬定我是“磨洋工”，就气势汹汹地跑来，二话不讲，一把抓住我的头发，拖到车头边的墙上去撞，“碰碰碰”撞得我眼前金星乱冒。撞够了，他又一把推倒我，跑去叫来拿摩温，毒打我一頓。他們打累了，叫我去挡车，我一橫心，拚死躺着不动。拿摩温威胁我說：“不要命了？当心日本人开除你。回去老板有好日子給你过！”

厂里除了日本領班监督工人外，还有許多日本婆子，也成天在各车间东蹿西蕩。她們穿着白上衣黑裙子、肉色絲袜、高跟皮鞋，擦滿了花粉胭脂，連頸脖子也是白的。这些“香人儿”嫌我們邋遢，检查出“毛病”来，也不高兴用手直接打我們，总是随手拔个筒管，敲我們的額角和手指头。敲的时候还不准我們动，不准我們扭来扭去碰脏她們的衣裳。

这些坏蛋，知道包身工年紀小，不大懂事，特别是沒有人身自由，好歹都得做下去，不象一般工人可以調厂，甚至关车

罢工。因此，对我们这些包身工，不仅在车间里任意虐待殴打，还要通知包身工老板，让包身工老板继续进行折磨。资本家所以用我们这些包身工，除了少付工资榨取同样的劳动力外，更重要的是任何时候都不必担心这些活机器会出什么故障。正因为如此，当时上海日本纱厂的工人里面，差不多有一半是包身工。

坏蛋掌握了这些特点，就放手剥削我们。纱厂劳动强度高，常常有工人生病停工，尤其是到了盛夏，车间温度高达华氏一百多度，工人无不浑身臭汗、糊满飞花，再加上机器“轰隆轰隆”无休无止地噪响，不发痧的人极少，往往一个组就缺额四、五个人。拿摩温一面串通书记照样把这些人当作上工的报上去，一面把这些人的生活分摊给我们包身工，工资则全部落到他们口袋里去了。在他们赚足外快的同时，我们却因受不住闷热和剧增的劳动强度，一个个晕倒在机台旁边。一天，一个姐妹倒在地上口吐白沫，拿摩温拽住她头发，拖到自来水龙头下去冲。等她稍为清醒一点，又逼她回机台边去卖命。

但是，不管日本鬼子怎样奸刁，老工人却有办法对付。常常趁日本领班和拿摩温午睡的时候，嚼点米饭吐在皮带上，使得每部车子都阴阳怪气、慢吞吞地转动，然后派上一两个人在路口上望风，带着我们大伙坐在皮带后头休息。阴雨天容易断头，这边刚接好，那边又断了许多，逼得我们只好跑着接。老工人看我们累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就说：“干脆不要接，让它断光，这种天气本来应该减慢车速的。”我们就听话不接，等到断头超过半数的时候，老工人就主动去找领班来看，结果每一次

都逼得日本領班只好承认气候的确太潮湿，應該重新調換牙齿盘，減慢车速。我們看到日本鬼子忙乱、尷尬的样子，无不暗暗好笑。

老工人办法真多，还常常故意把筒管藏在车弄堂地板下面的箱子里，說：“把筒管藏掉，沒有筒管就关车。我們不能讓他們这么便当地剝削、欺压我們。”这样干了好多次，日本領班都只好无可奈何地急急忙忙到布机車間去催送筒管。我看到老工人这样机智、勇敢地把局面变得輕松时，不由得打心眼里佩服她們，同时也从中得到了鼓舞。

老工人不但暗中作弄鬼子，还曾公开罢过几次工。开始我顾虑关车天数太多，拿不到工錢，要挨老板的打。老工人說：“怕什么！又不是你一个人，是全車間、全厂都关车嘛。你放宽心，关了车，正好休息。罢工是有組織的，一定能胜利！”我看她們信心十足，渐渐胆子也壮起来。結果，通过罢工，都达到了增加工資的目的，我从中也得到了力量。

日本資本家知道光靠上百个日本領班和婆娘，对付不了几千中国工人，他們还豢养了一批流氓、打手来加强統治，放縱他們在厂里找岔子、扳錯头，横行霸道。日本資本家从开厂起，就实行野蛮的抄身制，更利用这些败类在厂门口做尽各种坏事。

日本資本家在厂门口設置了两道九曲桥似的鉄栏杆，放工时，工人必須排着队被渾身搜摸。如果被认为有問題，就送进旁边的刑房吊打，甚至坐老虎凳。充当抄身汉和抄身婆的男女流氓，虽然在日本主子面前极尽諂媚的能事，但是并不能

得到完全信任，有时仍不免挨到几下。因此，他們在日本主子面前，把残害工人的渾身解数都施展出来，以求主子的贊許和獎賞。每天，当抄身汉和抄身婆对工人使劲捏、摸的时候，手执棍棒的日本鬼子就虎视眈眈地守在一边。看到抄身汉侮辱工人，搓弄得工人羞愤痛苦的时候，就拉开血盆大口狂笑起来；发现有工人被誣作“违犯厂规”的时候，就象饿狗一样扑上去。一年冬天，有个女工急于回家，在车间里没有把回絲紗头挖交清爽，到厂门口被搜出了一小撮。坏蛋們就大声嚷叫起来，說她偷紗，要剥去衣裳检查。这女工急得面孔刷白，极力辯白。坏蛋們最后还是剥光了她的衣裳，推出刑房挨冻。对待“犯规”的男工，他們的花样更多更毒，如多次把人倒架在太平龙头底下冲，灌得工人从鼻孔和嘴巴里噴出血来。

日本資本家只顧賺錢，根本不考虑什么劳动保护，厂里的工伤事故經常发生。一个和我同时进厂、在前紡车间做工的小姑娘，四只手指被机器齐根軋断，过了几天就被马马虎虎打发回乡了。这还算是輕的。有一次，在建造高烟囱时，日本資本家逼着两个工人爬上高空检修避雷針，由于沒有保险装置，避雷針和地面的电綫相碰，两个工人从烟囱頂上摔了下来，頓時粉身碎骨。日本領班只罵了一句“笨蛋”，就走开了。

在成千中国劳动人民的血汗喂养下，日本大康紗厂也象其他外国資本經營的企业一样，迅速地扩展了。在十二年内，由原来的一片紗厂，扩建到两片紗厂、两片布厂。許多工人，特别是包身工，却在資本家、包身工老板惨无人道的剝削、压榨下悲惨地死去。在包身工中，能做滿包身期限的，一般不到

三分之二。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搞出了史无前例的包身工制度，使得他们在上海拥有的纱锭之多，短期内就冠于各国之首，而他们所增加的每一个锭子，无不涂满了包身工的血，所开出的每一台机器，无不拖死了几个中国孩子。

### 敲骨吸髓

包身工初进厂每月工钱十几元(伪币)，几个月之后，加到二十多元，最后两年，很多人能够拿到三十多元，而包身工老板家的伙食钱实际不超过五、六元。这样，五年下来，老板在每个包身工身上就剥削了上千块钱，但是老板还不满足，还要想尽办法延长包身工的包身期。什么病假啦，被工厂开除后的停工天数啦，进厂前不做工的天数啦，甚至“八一三”日寇进攻期间躲炸弹的天数啦，都记了账叫大家补工，而且不是一工补一工，是随他高兴加码。因此，包身工无一例外地都要延长很久包身期，所不同的只是各有各的“理由”罢了。

我被延长了两年，理由荒谬得很：当时大康纱厂发放工资，是先在车间里发工资单，放工后到外面小窗口排队领钱。我们到“家”后，再将工资单和钱一齐交给老板。有次发工资单时，车间里生活很紧张，我就随手把工资单往饭单口袋里一塞，等到排队领钱时，发现不见了，我心急慌忙地里里外外找了好几圈，毫无踪影。我要求拿摩温给我证明一下，她却“拍拍”打我两记耳光，说：“看你这个蠢相就有气，掉了活该。”我去领钱处说明情况，他们不但不发，反而凶恶地骂道：“凭单领钱，没有单子就快滚！”

我不敢回去，直到夜深才偷偷溜进大门，钻到楼上躲进被子里去。不大一会，就听见老板娘大声叫骂着上来了，她把被子一掀，扭住一把头发拖我到厅堂跪下。我一再说明情况，她根本不听，操起拍棉被的大藤拍就打，直打得我哭不成声，她自己也打骂得声嘶力竭了。这时老板的小舅子又拿了皮鞭走来，对他姐姐说：“你歇一歇，我来治她。不好好治一治，以后还了得！”说着就一脚踏住我小腿，一手拽住我头发，一条鞭子忽上忽下地死抽，站在边上的老板娘还不时地加上一板，打一板说一句：“要不给你点厉害，你以后还会调枪花呢！要是不打，以后大家都会说掉啦！”

一会儿，到厂里去找我的老板回来了，他看我已被打得不成样子，就说：“好哩，再打下去明天不好上工了。”老板娘讲：“就这样便宜了她？半个月工钱，十一元钱呢！”老板笑笑说：“我便宜过谁？打也没有用，叫她补做两年工吧。”

我被打得皮开肉绽、死去活来，听说要补做两年，又恨又急，所以饭也不吃，只是躺在楼板上哭。许多姐妹心疼我，陪着我哭，几个大姐姐劝我：“月珍呵，你要硬气点，他们要我们死，我们偏要活，出头的一天迟早总会到来的。”老板娘听见了，又凶神恶煞般地转回来打骂她们，但是这几个大姐姐就是硬气，不哭也不求饶。

当我五年期满时，母亲喜孜孜地跑来看我。狠心的老板说没有期满，不准见面，后来母亲横讲竖讲才在老板娘监视下见了一面。老板对我娘说：“你女儿在上海做厂很好，要不是我领出来，在乡下早饿死了。你放心回去吧，没有什么多看

头，再补两年就可以帮你赚钱了。”一边就逼着我去上工。当我放工回来，知道娘已被撵走，就放声大哭。老板娘恶狠狠地讲：“哭什么，再哭就把你吊起来！”

就这样，我给这些吸血鬼吸了七年血。但是，熬过了七年，我还是没能逃脱他们的魔掌，他们还要榨取我的骨髓。

七年期满后，老板又讲：“你要做厂，就住在我这里吃带饭，每月交八块钱饭费；要不住在这里，厂就做不成。”有了七年的经验，我知道厂里和包身工老板是穿一条裤子的，包身工老板就象是资本家安插在厂外的工头一样，他要和我作对，厂方是不会让我做的。做带饭工的遭遇，和包身工也差不多，我已见得多了。因此我就讲：“好，我不做厂了，回乡下去。”老板这时露出狰狞的凶相来了，他横眉竖眼地说：“那么便当？你看看这是在什么地方！现在只有一条路，你照样做你的厂，照样住在我这里，领了工钱交给我，我每月扣你八元饭钱，余下的就给你存在银行里。要不，这些钱放在你手里，不是乱花掉，就是给人骗去、偷去。”

不由分说，我又被逼在他家吃带饭了。依旧是和包身工一样，除了从工房到厂，从厂到工房，不准乱走一步，有时积了几个夜班饭费，要去买布做条短裤什么的，还要老板娘陪着。她嘴里说是怕我走错，实际上是怕我们逃走。

我做满两年带饭工时，想回乡去探亲。老板娘讲：“有什么探头，又费钱又费时。”我惊讶地说：“钱？我做了两年了，积下的钱还不够做路费？”这时老板又笑咪咪地讲了：“够，够！在我手里的钱你笃定，我都一起给你存在银行里了，不信你去

看。我家大业大，自己的錢都吃用不完，不会占你便宜的。叫你不要回乡去是为你好，现在想进厂的人多，你再来就不知道哪天才写得进厂呢！”这些话会是真心話嗎？狗嘴里还能吐出象牙来嗎！后来的事实証明：老板这套假話和他过去的打罵一样，都是逼迫我們卖命，让他不断吸我們的血汗、榨我們的骨髓哪！

当我们满心以为多做一月工，好为将来多积存一点錢的时候，这些錢都照样进了他的荷包。在我又做满了第七个年头，由于日本资本家关厂，去向老板討錢回乡的时候，他竟說：“平时給你用光了，还有什么錢呀？”这句话簡直是象晴天霹靂，惊得我目瞪口呆，不由得問道：“你不是說給我存在銀行里嗎？”老板装模作样地拿出帳簿，又把算盘拨弄一陣，厚着脸皮說物价貴了，用項大了，我还倒欠他的。一来我們不会写不会算，二来也沒有人撑腰，只好强忍一口气，除了拿到几个盘纏錢，其他什么也沒有到手。

我第二次来上海，做了七年包身工，又做了七年带飯工，除了經受数不清的虐待，添上累累的伤痕外，什么也沒有得到。当我回到家乡，才知道我爹經不住苦难的重压，已經死去了。死的那年，正是我做带飯工的第二年，我娘曾經来过几封信，向我要錢，但是全被黑良心的包身工老板扣下了。我滿腹冤仇，但是身在黑暗的旧社会，又到哪里去伸訴呵！

\*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\*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\*

想到过去这一切，虽然事隔多年，还不能不怒火中烧，但是对比今天，却又不能不从心底里笑出声来。如果說解放前

的十五年，是当奴隶的十五年、被敲骨吸髓的十五年；那么解放后的十五年，就是作主人的十五年、大踏步前进的十五年。
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，换汤不换药，工厂内外，依然被资本家、把头 and 流氓把持着，工人要进厂，得先拿出大把的钱交给他们，我因为穷，就一直被关在工厂的铁门外。直到解放后，1950年，我才重新进了国棉十九厂。记得那天，我一进厂门，就感到天地都不相同了，处处是红旗招展、歌声飞扬。过去工人们脸上常见的愁云惨雾都不知哪里去了，人人喜气洋洋、笑语盈盈。当我知道包身工制度已被废除，黄老板等有罪行的包身工老板经过斗争判处了管制、劳改等处分的时候，我脸上腾起了翻身的欢笑。进厂不久，党又领导我们废除了拿摩温制度。这些，使我开始懂得了两种社会的天渊之别。越往后来，这种感受也越为深刻，我常常因为一件在今天的年青人看来是极为平常的事情，而感情激动。

比如，国家为了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，花了许多资金装置暖气和冷风等设备，使车间真正达到了冬暖夏凉。这还不算，到了夏天，领导说车间是“前线”，于是干部都端着清凉饮料和擦脸毛巾到机台边来照顾我们。当我接过一块喷香的毛巾的时候，眼泪也几乎落了下来。因为，我不由得想起了过去中暑昏倒、而被拿摩温拖去冲自来水的那个包身工姐妹。别看这块毛巾，它却使我更深切地体会到“换了人间”这句话的意义。

党和国家为了保护我们工人的健康，采取了许多措施，派医务人员每天推着药车在各车间巡回医疗。有一次，我的脚

不小心被刮破了一道小口子，医务人员知道后，特地走来给我上药。我因为生产忙，也因为根本没有把这点小伤放在眼里，就说：“算了！”可是她怎么也不答应，硬拉着我上药。我看着她轻捷仔细地擦洗伤口，又不由得激动起来。因为就在这个伤口旁边，有一处旧伤疤，是过去当包身工时因为拈除烂腿上的飞花，遭到日本鬼子毒打留下的。旧社会在我身上留下许多伤疤，而新社会里党像母亲一样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我们工人的健康，这种对比，叫我怎能不热泪盈眶！

现在吃饭时，关车半小时，食堂里有的是价廉物美的饭菜，领导干部不但经常征求我们对伙食的意见，还亲自当炊事员，以便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，目的是让我们吃得更好。与此同时，领导上不仅帮助我们工人在工厂宿舍里安了家，为了避免宿舍里孩子吵闹，影响睡眠，还专门腾出房子，开辟夜班工人的宿舍，目的是让我们休息得更好。因此，象我这个过去连整顿饭食都没得吃、一个铺位都没得睡的了头，在今天从当炊事员的领导干部手中接过一份饭菜的时候，或是睡上厂里特备的枕席的时候，又怎能叫我不感到分外地甜美，分外地激动呢！

当然，这还只是讲的一些生活上的变化，如果要讲政治上的变化，那就更大了。回想解放后的十五年里，党先启发我在小组会上发言，再鼓励我到车间、甚至全厂的大会上去提意见，引导我这个普通工人一步步地参加了管理国家企业的大事。并且又在政治上、文化上帮助我提高，积极肯定我的些微进步，也热情批评我的一些缺点。在党多年来的刻意培养下，

我终于在 1954 年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，由一个只是为了吃饭而做工的人，变成了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。

领导说我受的苦多，对新社会的体会深，常要我出席一些会议，给青年们作回忆对比的报告；解放以来，每年都有一些艺徒和工业中学的学生，到我机台边来实习，闲下来，我也常主动跟她们谈谈自己过去十五年的奴隶生活。我所以要谈，是因为我知道，只有懂得过去的苦，才能真正体会今天的甜。我要告诉孩子们，罪恶的旧社会虽然已经过去了，但是那些旧社会的吸血鬼是不会甘心的，他们阴魂不散，还想卷土重来。我们一定要牢记阶级仇恨，鼓足革命干劲，把革命事业进行到底，不但要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、强大，还要为了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、没有资本主义、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而奋斗！

(程浦林整理)

